

# 促进文明互鉴语境下 中国文化元素的有效传播

——评跨文化传播案例库的当下价值

于丹

去年夏季,我在澳大利亚介绍中国文化时提及《孔雀东南飞》的开篇“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当“徘徊”二字声音未落时,一位满头金发的外国男孩举手示意我他有疑问。他的问题非常有趣,无论是在中国的中学、大学课堂还是大众视域中,小男孩所问出的问题应该不会在中文语境中被问出。小男孩特别认真地问道:“请问是几只孔雀?”这个问题使我更为深刻地明白语言差异背后带来的思维差异。英语中的名词有可数不可数之分,对应的数词和量词会有单复数的差异,而汉语中的名词出现时,可以不必有单复数的硬性规定。在中外文化的互动交流中,诸如如此的触动绝非偶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走出国门的大场面文艺汇演曾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种现场看似热闹、过后往往难见成效的文化传播方式不能不引发学界思考: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元素如何能够实现有效传播呢?

早在1964年,麦克卢汉便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现代科技的飞跃发展,极大地缩短了地球上的空间距离。近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8次会议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也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世界性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便利,整个地球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一样,未来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写完《美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后,在后记中便提到,“在经济上我们全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利害相连,休戚相关,一个世界性的大社会业已形成。但是各地的人民却还有着他们从个别历史中积累成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同样一件事、一句话,可以在不同文化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比如我们在蒙学教育中经常会提到的“孔融让梨”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一直是谦让有理,诠释出“悌”这个中国文化伦理范畴。但是在这个故事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国际受众的反馈可能会让中国人群众大吃一惊,有些国外受众认为这是孔融不诚实的体现。如何看待这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观念差异,这恐怕是中国文化有效传播的一大难题。费孝通先生指出了一些方式,比如用理解的方式去说服个人,用感情的方式去取信于人。美国著名议员福尔布莱特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获得一种移情能力——能够从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能够承认他人有可能看到我们不

曾看到的东 西,或者比我们看得更仔细。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要主动交流,而不是强行灌输、强给硬塞——归根到底,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一个口号,也不只是我们背下来的四大发明,它是从孩子到老人,在生命的每一个季节都能对自己的文化存有一份骄傲,保持一种苏醒。只要人们都有了这种感觉,才可能拿这个和世界对话。文化自信也意味着既能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也能坦然对待那些不喜欢我们文化、甚至批评我们文化的那些声音。

通过那些批评之音,我们要去深入到中国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核之中,分析那些批评是否属于文化误解、中国文化是否在传播过程中存在或发生变异,是什么因素导致其产生误解及变异。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探究,才能更好地应对中国文化元素对传播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中国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是“大块头”,不是“墨菲斯托”。习近平主席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时曾如是说。这一介绍方式运用了西方世界普遍熟知的“墨菲斯托”形象,不仅易于拉近受众的心理距离,还便于解除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误读和曲解。在文化多元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跨文化对话是必由之路。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思想,文明互鉴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借鉴、融合过程中体现出来。2015年5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讲到了“200多名苏联飞行员援华抗日牺牲在中国战场”的故事;10月,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的讲话中,谈到同时代的“东方的莎士比亚”汤显祖,倡议中英两国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2015年11月,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时,讲到了青蒿素与越南的故事;在外交场合,习近平主席多次与外国领导人一同“茶叙”,通过中国茶讲故事、共话友好来力。

正如一直致力于跨文化研究的乐黛云教授所认为的那样,只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异性,就很难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的,但如若不强调相异性,则又会发生混同融合等情形。差异性建立在对自身充分了解、充分认识并足够理解对方的基础上,它需要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平和的心态、双方想要相互了解的渴望。在各个民族的不同思想中,具有一致性的认知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可汇聚在一起并从内部相互证明。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在向国外观众介绍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时主张使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

叶”这一传播方式,实际也证明这对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来说无疑是极为有效的国际传播途径。

正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聚焦“一带一路”这一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寻求全球化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故事性、传播点、人类共同价值的文化元素;以不同文明视域下的文化符号比较,探寻中国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具合理性的国际表达方式;从思想领域、艺术领域、生活领域等视角切入,对比研究中外哲学思想、国家形象、精神建构、文学艺术、建筑艺术、节令习俗、生活习惯、运动休闲等方面,挖掘中外文化中的契合之处;以手牵手结对子的方式,完成“孔子与苏格拉底”“龙与Dragon”“茶与咖啡”“春节和圣诞节”“太极与瑜伽”“故宫与卢浮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潘查希拉’协议”“希望工程音乐教室与委内瑞拉音乐救助体系”等多项案例的传播比较研究。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人所共有的,是思想”,也正基于此,泰伦斯才会认为“虽说不认识的人无比多,但至少我总‘能’理解他们。”跨文化传播案例库的研究与搭建不仅是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外文化符号所作的跨文化传播路径分析,更是在总结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获得中国文化互动传播发展的借鉴与启发,同时更可能具体地提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能够实际解决传播问题的方法与策略,尽量避免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禁忌与冲突,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原料、找准方法、铺平道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无论何种文化,当其在“异”的语境中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离不开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离不开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文化基因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发展、传播的基本因子,中外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元素在国际视域中的有效传播,正是立足文化基因、基于平等与平和心态之上的自立与自信。《尚书·尧典》里所说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指的是各有特色的多种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而不是融为“一邦”、融于整齐划一的声音。文明互鉴语境之下中国文化元素是否能够有效传播,离不开“协和万邦”、全世界各个民族普惠发展的美好愿望与有效行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跨文化传播案例库中的每一个案例探索只是文明互鉴宏途之中的微小一步,但我们希望这样的步伐能够坚持得更久、走得更远。

二次元文化、粉丝文化、网络文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亚文化逐渐进入了主流文化视野,并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词汇的跨界流行正在打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次元之壁”。网络时代是语词“核爆”的时代,欣欣向荣的网络亚文化空间,不断凭借自己的文化基因、创造力与想象力创生出崭新的词汇、语法与文化,这其中的一部分方生方灭,短暂流行后便被人们永久遗忘,另一些则以强大的生命力成功跨越圈子壁垒,甚至进入主流话语空间,在当代汉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比如起源于动漫爱好者中的词语“萌”“脑洞”等已经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来自粉丝文化的“打call”一词则因2017年国庆节以来“我为祖国打call”的句式而迅速传播,又比如“高富帅”“白富美”“逆袭”“女神”“搬砖”等概念本身都产生于百度李毅大帝吧这一网络亚文化空间,现在则广为人知,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交流体系。

另一方面,随着电商勃兴,以及经济发展从工厂批量生产模式逐渐转向在地生产、个性化生产与私人订制模式,网络亚文化中的周边同人传统、手作风潮都体现出了创造利润的巨大动能,成为长尾效应最典型的受益者。而网络文学则更是作为影视、动漫、游戏改编最重要的IP源头,成为整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石,基本上完成了主流化的进程。

但即使在今天,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仍旧横亘着一道“次元之壁”,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隔阂与误解仍旧是广泛存在的事实。比如说“宅”这个词,源自日语词汇“御宅族”,在二次元文化中的含义是“非常喜爱二次元文化的人”,但进入到主流文化中后,却因为“宅”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本意而被误用为“长期待在家里不出门的人”的意思,这个误用又反过来形构了人们对“二次元宅”们的刻板印象(天天躲在家里看动画片、不出门且有社交恐惧症、不务正业,甚至是肥胖丑陋不修边幅),加深了主流文化对二次元爱好者的误解。造成隔阂与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由于中国主流流行文化相对于世界流行文化而言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中国的网络亚文化是在广泛借鉴日韩、欧美等地区发达流行文化内容、符号与风格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网络亚文化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本土化过程,但仍旧是兼具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其中所蕴含的大量异域文化基因,对于主流社会而言是相对陌生的。以Cosplay文化为例,这种借助服装、妆面,以及假发、美瞳等道具扮演自己喜爱的角色的文化,其主导审美风格来自日本视觉系文化和动漫文化,对于主流社会而言,这两种文化及其审美风格都是全然陌生的,于是骤然见到盛装的Cosers时,便将之目为“奇装异服”,全无欣赏认同之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其次,网络媒介为这些网络亚文化提供了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这些

## 网络亚文化的「破壁之旅」

王玉瑾

亚文化长期在不受主流社会关注的状态下野蛮生长,已然创造了自身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文化生态及丰富的文化成果,主流文化想要消化如此庞杂的信息,是需要时间的。

语词中记录着思维的路径。对于语词的理解,或许是打破“次元之壁”的第一步。由北京大学邵燕君老师主编、15个作者共同撰写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便在二次元文化、粉丝同人文化、女性向耽美文化、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社会流行词这六个网络亚文化类目中遴选了200余个关键词,用严谨的学术态度辨析含义、考据源流、举证用例,把圈子里的“黑话”和故事讲给圈子外的人听。此书收录的关键词不是转瞬即逝的流行热词,而是那些具有生命力和跨界能力,长期停留在人们口头笔边,真正能够反映出圈子生态的网络文化关键词。就像邵燕君老师在《破壁书》前言中所说,这些关键词就如同一口口深井,井下水脉勾连。由这些关键词出发画点连线,便能勾勒出一幅幅地图,打开通往网络亚文化空间的奇妙之旅。

## 别用“戏子”辱没文化

杨晓华

日前,因为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揭露影视圈内幕而引发的对影界天价片酬和收入合法性的讨论已是沸沸扬扬。国家税务局第一时间回应舆论,声明将依法展开调查核实。这一尚在发酵中的事件,若有正确的价值流引导,可望成为改善影视圈甚至整个演艺圈风气,提升从业者道德修养的良好契机。但是连日来,坊间尤其是网上出现不少人,不断用“戏子”指斥影视演员,这表面上是为了伸张道义,背后却显露出缺乏知识和涵养的霸蛮气质。

“戏子”是旧社会专门称呼职业戏曲演员的词汇,具有明显的轻侮和蔑视意味。中国戏曲源于古代的优伶,优伶的歌舞和戏谑,曾经给王侯将相提供了休闲和娱乐,但是却始终在社会地位上被贬斥。在杂剧兴盛的元代,有法令明确规定:“娼优之家,及患瘵疾,若犯上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及至戏曲繁荣的清代同光年间,曾深得慈禧太后赏识的名伶杨月楼因为与粤商女儿的私情,竟被法办,主要原因就是“定例良贱不可为婚,总不合事理”,可见戏曲演员无论如何出入显贵门厅,依然难以洗刷出身低贱的污名。实际上,旧社会的绝大多数戏曲演员居无定所、随遇而安,游走勾栏瓦舍、乡野田间,收入寒微,地位低下,再加上确有不少演员和戏班,为了迎合市场,肆意营造粗俗低劣的节目,寡廉鲜耻地厮混于社会边缘,愈发沉湎了跨越各个阶层的对戏曲演员的轻侮和蔑视。

其实,从优伶到戏曲演员,只是社会分工中的职业分化,这一职业的功能及性质和其他职业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别、天然优劣。从古代开始,就有一些优伶虽然地位卑微,却如忠臣烈士般心怀天

下大义,优孟哭谏楚庄王,石野猪巧谏唐僖宗,皆以卑贱之身而立奇伟之功,被传为美谈。在戏曲繁盛的明清时期,戏曲行业的道德自律十分鲜明。我国戏曲界崇奉“西秦王爷”和“田都元帥”,就是通过这两位保护神的功业和气节故事,感召梨园子弟勤学苦练,洁身自好。

从学术上说,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将戏曲艺术首次纳入现代学术的家族,客观上也肯定了戏曲演员的重要价值。梁启超首倡戏曲改良,他以天纵英才、文化大纛的身份将汤显祖、孔尚任、蒋士铨和拜伦、弥尔顿相提并论,称誉谭鑫培“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卅纪轰如雷”,都极大地提高了戏曲和戏曲演员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经济基础和文化体制上彻底改变了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对演员的保护和尊敬不断被强化。

因此,今天有不少人动不动还说“戏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当道”“戏子误国”这样严重侵犯戏曲演员,乃至于全体表演艺术尊严的浑话,甚至发明“将军坟前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这样的词句,看似义正辞严地在推崇科学家的时代作用,却又体现出污名表演艺术的荒唐粗陋。正如莎士比亚所言:“大千世界是个舞台,人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诗人席慕容说:“台上,我们演绎得如此逼真,如此精彩,仿佛如痴如醉,孰不知,花开花落,草长莺飞……台下,当戏已落幕,霓虹和鲜花都不复存在,耳边仍萦绕着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洗去精心涂抹的油彩,原来只有你孤身一人,独自背负着寂寞。”如果非要使用“戏子”这一词,不如说,在生命和时间的流逝中,我们谁不是美丽而又消逝的戏子呢?

## “从‘但是’以后开始说!”

袁莉

“看完以后有一种‘有意为之’的感觉,整部剧都是一个调子,不是太自然。是否可以增加一点亮色在里面?”“动作构成可以再丰富,不要在一个定点上折腾,舞蹈要流动起来。”“音乐上‘动静’大于‘动情’,结构上有骨架缺血内。”“形式媒介使用很丰富,但现在形式和内容还是两张皮。”这些无数的意见,出自近日国家艺术基金某滚动资助项目专家研讨会上的专家发言。

类似的场景在国家艺术基金成立四年多以来为其资助项目而组织的专家研讨会上并不鲜见,与会专家因意见有分歧而争辩得脸红脖子粗的现象也常有发生。无论项目申报单位是国有大院团,还是民营企业;无论项目主体是经验丰富、获奖无数的艺术家,还是初出茅庐的小字辈,人人平等、无一例外,都只能凭作品说话。

这种只看作品、不看情面的研讨模式,近年正在逐渐形成。这来自于文化界内部的呼声,也是国家再三倡导的结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主持召开的工作座谈会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在我们还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等现象的文艺创作界,不仅需要高标准严要求的创作;也需要尖锐有效的批评,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要善于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中国人向来讲究“面子”,说话要留几分余地,习惯说你好、说好听话,即便真有什么意见要提,也会“先扬后抑”,待好话说尽,再以“但是”开头来委婉提出一些

异议。如此惯例,几成沉疴。确实,在一个领域呆久了,无论做创作还是搞研究,可能都会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在研讨会上因意见不合而短兵相接,以后“还能不能好好做朋友了”?其实,这种“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的氛围,绝不会成为产生伟大艺术作品的温床。长期缺乏良性的沟通、碰撞、鞭策与激励,文化艺术从业者既无法正视自身的问题,也很难吸收新鲜的艺术养分,容易陷入故步自封、自说自话的小天地而无法突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有表达的权利,无论怎样创作,都是艺术家的自由,和评论家关系不大。然而,艺术价值的高低自有定论,优秀的艺术家更须具备责任感。越是流传广的作品,越是要承载其对社会使命感和影响力。只强调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而罔顾艺术规律、客观真理与时代要求,无法产生接地气、立得住、传得开的伟大作品。

创作与批评,对于文艺事业来说,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两者相辅相依,不可偏废,但却常各执一端、彼此较劲,这才是正常的文化生态。自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布以来,文化界“一团和气”的氛围逐渐有了变化。以国家艺术基金为例,从成立初始,就为专家研讨会定了基调:对已经过层层遴选的人选作品,要发挥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抱着“鸡蛋里挑骨头”的心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望闻问切”,找到病根、开出良药,使其精益求精、不断打磨,“七稿八稿没完没了”,直至臻于完善。使笔者印象深刻的是,针对有些专家“该怎么说”的问题,主持当场研讨会的基金负责人态度很坚定:就从“但

是”以后开始说!

当然,在面对作品时,评论家绝不仅仅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更不是展示个人独特观点的秀场演讲。“批评不可滥用,尤不可妄用,须有相当的学养,有公正的见地,有远大的眼光,有绵密的思想,方可举起批评的权杖,而确定一切重新确定的价值。”(王统照语)。若要达到有效、有力、有公信力,还需评论者在批评精神、审美标准和评判标准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反复琢磨、缜密全面的思考。因此,为了能一语中的,鼓励其优异、指出其不足,扎扎实实说到点子上,评论家们往往也并不轻松,一部作品翻来覆去看七八遍,笔记密密麻麻做了几大页,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参与作品研讨会,这在文化界已非常普遍。

有了专业、公正、优秀的评论家这层“关口”,创作者就会脚踏实地又忐忑:踏实的是,有行家手里把脉,作品会离“高峰”更近一点;忐忑的是,创作过程中哪怕有一点点投机取巧的小花招,恐怕都逃不过专家们的“法眼”。几年下来,一些有“火药味儿”的文艺研讨会已经在文化界赢得了声誉,对于创作者来说,“追求艺术上的精进”已从最初为了“应对厉害的专家”,逐渐演化成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和自我要求。

“舍其旧而新是谋”,破坏与创造是批评包含的双重内蕴。“从‘但是’以后开始说”,说完之后呢?问题不能被搁置,而是要踏踏实实去解决。一个好的作品,只有经历千锤百炼,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是以艺术创作者和评论家为主导的文化从业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文化建设提出的迫切要求。